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 思想分析

张小明

内容提要 约瑟夫·奈最早明确地提出并论述了“软权力”思想,他所说的软权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的软权力思想提供了一种分析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之重要思路,它引导人们关注那些抽象和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有助于人们克服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性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软权力思想既有创新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继承,因为传统权力思想既重视具体和物质性权力因素,也关注抽象和非物质性权力因素。奈把权力简单地一分为二,使其软权力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因为他无法阐述清楚软、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软权力的大小也难以被测定和衡量。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约瑟夫·奈 软权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以及他于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权力》一文中,最早明确地提出和论述了“软权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书名为《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这个中译本对原书内容有删节。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并使之开始流行起来,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不仅如此,这个由美国人创造的概念很快便在其他国家中流传开来,并被加以不尽相同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软权力”概念的产生与流行本身,正是美国拥有的软权力的一个表现。美国人所创造的概念往往总能够风行全世界,这也应该算是“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吧!

“软权力”思想的基本内涵在奈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清晰地表述,他后来所发表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基本上都是在重复1990年提出的观点,但是对此也有所补充和扩展。特别是他在2004年出版的新著《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一书中,除了对过去阐述的有关“软权力”思想进行比较系统地梳理和更为清晰地表述之外,还就其他行为体所拥有的软权力及软权力的量化分析等等新的问题做了一些阐述与分析。

本文主要从软权力概念的含义、软权力思想与传统权力思想的关系,以及软权力思想的局限性等几个方面,对奈的软权力思想进行一些学理上的分析。

一 “软权力”的含义

奈所说的“软权力”具体指的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奈在很多著述中,都对此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软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然而,“权力”(power)却是一个难以界定其含义的概念。奈自己就把权力比喻为爱情,说它易于体验,却难以定义

对中国读者来说,“软权力”无疑是一个外来词汇。同其他很多外来词汇一样,它有多个中文译名。最早的中文出版物把“soft power”译为“软力量”。后来,更多的人采用“软权力”这个译法,也有一些人把它译为“软实力”或“软国力”。台湾一位学者把它译为“柔性国力”。本文作者倾向于使用“软权力”这个译名。因为在已有的中文著述中,“power”一般被译为“权力”,“soft power”也应该相应地被译成“软权力”,而且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是使用“软权力”这个译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译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外来词常常找不到十分准确的中文对应词,“power”和“soft power”就是如此,我们没有必要断定哪一种译名是最准确的,每一种译法只能做到相对准确。

Brooke A. Smith-Windsor, “Hard Power, Soft Power Reconsidered,” *Canadian Military Journal*, Autumn 2000, pp. 51 ~ 56.

或者衡量。同时,他也把权力比喻为天气:“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就像天气一样,虽然人人都在谈论它,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正如农民和气象学家努力预见暴风雨的来临一样,政治家和分析师试图理解国家间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权力变迁不仅影响各国的命运,也常常伴随着世界大战的风暴。”

虽然“权力”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它却很难被加以准确定义。有关权力的定义有无数个,但是人们通常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按照字典的解释,“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给“权力”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他认为,权力是指那种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而奈给“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是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我认为,奈的这个定义同达尔的定义有不同之处,奈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目的,即权力是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而达尔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即通过改变他人的意志或者控制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这并不是说,奈不重视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恰恰相反,正是在论述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基础上,他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从而阐述了其软权力思想。

奈指出,有很多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威胁和奖励他人,也可以通过吸引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者是运用“硬权力”,后者是施展“软权力”。在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软权力”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 25;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1.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 25;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2000), 3rd ed., p. 55;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1.

美 丹尼斯·朗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第 6 页。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 26.

Ibid., pp. 25 ~ 26.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2.

“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奈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而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而“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也就是说,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奈喜欢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软权力”的作用: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假如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确立信念和偏好,那么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就会比单纯依赖积极管教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奈认为,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转化,越来越不太具体,越来越缺少强制性。实际上,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软权力就是吸引力。

归纳起来说,奈所说的软权力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文化(culture)吸引力。他所说的文化是指普世性文化(universalistic culture),也就是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然而,“文化”是一个内容很广、也很模糊的概念,很难加以定义。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电影、电视、报纸、网络、饮食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文化的范畴之内。很显然,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无疑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美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多软权力,美国文化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奈所说:“不管我们做什么,美国的大众文化都具有全球影响。好莱坞、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宣传自由、个人主义和变革(还有性和暴力)。笼统地说,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权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8.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p. 31 ~ 32.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ed., p. 57.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p. 31 ~ 32;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ed., p. 57.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 33.

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第二,意识形态 (ideology)或政治价值观念 (political values)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样也是难以定义的概念。奈本人在论及软权力源泉的时候,常常把“理念”(ideas)、“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等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加以混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新著《软权力》中论述软权力三个主要源泉时,使用了“政治价值观念”的提法。但在该书的某些地方,他也提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实际上,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它们列入文化的范畴之中。

第三,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 (international norms)及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具有“制度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他在2004出版的著作《软权力》中,使用了“塑造国际规则”的提法。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 (shape)国际规则 (international rules),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

以上便是奈所说的软权力的几个基本内容。这些一直是他在论述美国的软权力源泉时特别强调的方面,正如他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美国软权力的一个源泉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何向东、杨德、唐建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5页。

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一书中,他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见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 32。在后来的著述中,他有时使用“意识形态”,有时使用“观念”(ideas),有时使用“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见: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ed., p. 57; Joseph S. Nye, Jr., “Honey of Soft Power Will Catch More Flies,” *Th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7, 2003;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9~12页。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11。

Ibid., pp. 10, 23, 50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p. 33~34.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p. 10~11.

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则纷纷效仿;软权力的另一个源泉是文化输出、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材料;软权力也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发挥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选择,这些国际组织巩固了美国的软权力。”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软权力含义只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也不是说所有软权力的源泉都可以被纳入这三大范畴之中。奈在著述中就指出过“信息”、国家政策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它们也可以被列入软权力的范畴。比如,奈提出了“信息权力”(informational power)的概念。在他看来,信息革命通过促进非集中化和民主,正在改变着政府和主权的性质,使得非政府角色的作用得到增强,并使外交政策中软权力的重要性增加。同时,创造很多知识的国家也能产生吸引力,笼统称为信息技术的东西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权力源泉”。但是,奈也指出,拥有大量和丰富的信息并不一定意味着获得的权力大,筛选信息的能力更为重要。又如,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奈特别提醒美国政府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包括盟友的利益,要与他人协商,要使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相吻合。特别是在《软实力》中,奈把对外政策同文化、政治价值观念一道,列为软权力的三大源泉之一。他在最近几年一再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单边主义行为,包括不签署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及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等,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

那么,软权力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最近十多年来,奈一直在宣扬软

Joseph S. Nye, Jr., "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 *New York Times*, Jan. 3, 2000.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 34.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45~47页。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ed., pp. 197~204.

Khatya Chhor, "Westem Press Review: Using 'Soft Power,' Central Asia, and Can Torture ever be Justified," <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3/01/10012003180142.asp>; Joseph S. Nye, Jr., "Honey of Soft Power Will Catch More Flies"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11.

Joseph S. Nye, "The Power of Persuasion: Deal Components of US Leadership,"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2003;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p. 13~15.

权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比如在阐述软权力的作用时,奈在1990年的书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起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需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如果它能够帮助支持那些鼓励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家所喜欢的方式采取或者限制自己行为之制度,那么它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就可能没有必要过多地行使代价高昂的强制权力或者硬权力。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和它具有的建立一套管理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在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软权力源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正是因为软权力的重要作用,所以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的所谓世界将进入国际政治中的日本时代这一论点,奈明确指出,相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很大,这使得它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奈的话来说就是:“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某些变化将对日本有利,但有些变化可能对美国更有利。在命令式权力方面,日本的经济实力正在增强,但其在资源方面很脆弱,而且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在同化式权力方面,日本的文化高度孤立,而且它尚需要在国际制度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相反,美国具有世界性的大众文化,在国际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奈提醒美国政府:“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并不造成文化一统化,世界其他地方不会有朝一日看起来都像美国一样。在全球历史的这个时期,美国文化是非常卓越的,它有助于在许多方面、但不是所有方面增进美国的软权力。与此同时,移民和国外的思想和事件也在改变着我们本国的文化,而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吸引力。我们对保持软权力很有兴趣,我们现在应当利用这种软权力来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一致的世界,以便来日我们的影响力缩小时仍有利于我们。”

总之,“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而言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它指的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p. 32~33.

Ibid., p. 33.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104页。

是“同化式权力”,它主要来源于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感召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与决定国际议程的能力。软权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二 软权力思想与传统权力思想的关系

奈软权力思想的特点是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并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虽然以前也有学者提出过类似思想,但“软权力”概念确实是奈的创造物,也正是他非常系统和清晰地表述了软权力的思想,并使之风行世界。不仅如此,奈明确地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层面,并且强调了非物质因素(如文化、价值观念和国际规则等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而克服了过去许多现实主义者,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使得权力思想更为全面与完善。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另外,奈把国际规则视为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源泉的思想,实际上是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认识权力源泉的,这无疑具有创新意义。

换句话说,奈的软权力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权力的性质或者权力的源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观点认为,“军事实力主导着其他类型的力量,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必将支配着世界事务。然而,权力赖以产生的资源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实际上,这个变化过程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非物质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奈的软权力思想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补充与发展。“软权力”概念的提出,的确如同我国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它可以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新的理论思路之一。

在另一方面,本文作者以为,这种软权力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对

如有学者指出,奈的“软权力”概念是受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文章的启发提出来的。这两位学者在1962年美国的《政治评论》杂志中发表了《权力的两张面孔》一文,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second face of power)的思想。见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和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第11页。

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传统权力思想的回归。

事实上,虽然过去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像奈那样把“权力”明确地分为“软权力”和“硬权力”,但是他们所说的权力既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是融软、硬权力因素于一炉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政治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权力可分为四种: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政治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则认为权力有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美国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莱因霍尔德·尼伯尔(Reinhold Niebuhr)说得很明白,权力是“一种复合体,其中物质力量,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只是组成部分之一”。他进一步写道,许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完全不理解适当地尊重道德力量可以带来政治威望;而政治威望本身就是不可缺少的权力源泉。”美国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及后来增补的政府质量等九项国家权力的要素。显然,他也是把国家权力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将国家权力要素归纳为十条: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把权力笼统归结为三大要素: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该单位的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集体行动的能力(涉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在上述列举的国家权力因素中,既有物质的要素,也有非物质的或精神的要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把无形的权力看得很重。

张丽东:《永远的摩根索》,学林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9页。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 转引自: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0页。

丹尼斯·朗:《权力论》,第 26~75页。

转引自(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47页。

张丽东:《永远的摩根索》,第 124~125页。

他特别强调外交质量、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比如,在谈到外交质量的时候,摩根索指出:“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一个国家外交的质量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在谈到民族性格和国家士气时,他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还说,“民族性格不能不影响国家权力,……俄国人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创造性,英国人的不拘于教条的常识观念,德国人的纪律性和彻底性,是这些品质中的一部分,它们无论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都要在国家成员可能参与的所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他在分析国家实力时,把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力量的影响看得和军事力量同等重要。例如,他在《国家间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是这样写道的:“为防止对权力中心要素的误解,这些要素一直被过低地估计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现在必须使它和物质的力量同等重要,特别是和军事一样重要,我必须比以前更加强调非物质的因素,特别是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并且要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详细讨论。”摩根索还告诫人们,物质力量的顶峰不等于国家权力的顶峰,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仅凭物质力量,就可以长期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摩根索尤其反对把国家权力简单地理解为武力,他说:“有一种倾向,试图将政治权力贬低为武力的实际运用,或至少将它等同于成功的武力威胁和诱迫,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175、181页。

许嘉:《权力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

同上,第71页。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39页。

也就说,过去的理论家们,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权力实际上是包含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用奈的话来说,是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这两个方面的。但是后来不少理论家们(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在分析权力的时候,过于追求简约的目标,过于关注物质层面的权力资源,特别是军事力量或武力,或者强调武力优先、武力第一、武力是政治权力的最终形式,从而具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比如有的学者在分析冷战后美国、俄国、欧盟、中国和日本的权力对比的时候,通常就是依赖以下几个具体、有形的统计数据:人口、国土面积、国内生产总值(GDP)、经济增长率、国防开支、军队人数、远程核导弹、作战飞机、航空母舰、作战舰只、潜艇、主战坦克。这种注重那些容易进行定量分析的物质权力的做法,无疑忽视了权力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

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国家除了行使物质权力外,从来就没有放弃对非物质权力的行使。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加强同苏联在第三世界争斗,利用了文化这一有力的武器。美国从肯尼迪政府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以教师、医生、护士、农业专家和工程师为主要成员的和平队,这对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形象、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大众文化等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在冷战结束后,和平队更是获得了美国两党的一致认同,受到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其职能也相应地增加。

奈虽然宣扬软权力或非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但也没有轻视硬权力或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他在《软权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权力并重。因此,软权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Josef Joffe,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Phoenix, 1998), p. 9.

刘国柱:《后冷战时期和平队的历史走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p. xiii, 32, 129, 147.

三 软权力思想的局限性

奈把权力简单和人为地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部分,并重点论述后者的重要性。这看上去一目了然、简单易懂,并且很有说服力。这也是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条件,否则难以提出和表述一个清晰和严谨的理论观点。然而,这种简洁明了的思路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权力不能简单地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所谓的软权力与硬权力之间的界线并没有那么清楚。另外,不只是软权力资源可以对他人产生吸引力,硬权力资源(比如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可以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使得奈的软权力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内在的局限性,并因此招致很多人的批评。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著述(特别是最近发表的著述)中,努力对软权力思想进行一些修补,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一个局限性是,奈无法解释清楚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软权力”和“硬权力”都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或者不同的表现形式,两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得很明白,即硬权力决定软权力,或者硬权力是软权力的基础。他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这是很多人的看法。比如一位中国学者做出过类似的判断:“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软权力’方面处于弱势。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增长起来之后,其文化价值的力量就会加强。”另一位中国学者也表明了类似的态度:“不可否认,政治权力实施的主要方式是强制式的,而且强制式方式是非强制式方式的基础,就是说,权力因素中软权力因素固然越来越重要,但硬权力的存在是软权力实施的前提。”

一方面,奈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样的看法。他曾经说过,硬权力能够产生软权力,如使用武力控制或夺取电台、电视台等等信息制造和传播工具,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张丽东:《永远的摩根索》,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便可以获得“软权力”。另外,他还指出,财富也能够导致“软权力”,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之所以设在亚特兰大,而不是在安曼或开罗,是因为美国在工业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美国有线新闻网1990年在世界人民面前把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事件视为侵略行动,如果一家阿拉伯的公司能够拥有这么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视台的话,那么这个事件也许就会被视为针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雪耻行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软权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权力。比方说,梵蒂冈的软权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今天,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大,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入人心的行动,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同时,奈也指出,硬权力的使用也可能损害软权力。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欧洲拥有很强的软权力,但是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尽管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继续增长,但是苏联借助于硬权力而实行专横的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权力。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使得他近年来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指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了自己的软权力。在2003年初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奈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伊拉克过于依赖硬权力、蔑视国际制度的单边主义行为,会损害自己的软权力。

由于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奈实在是无法表述清楚,最后只能很笼统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仅此而已!这也难怪他的无奈,因为把权力一分为二的做法就有简单化的倾向,把融为一体的东西分为两个部分后,再去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徒劳无功!另外,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可以归结为哲学上所说的物质与精神或者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答案的学术难题。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ed., pp. 57~58;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10~11页。
Joseph S. Nye, Jr., "U. 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3.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92页;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5th ed., p. 61.

第二个局限性是,软权力的大小难以被测定和衡量。

一般说来,衡量权力大小有两种途径,一是由资源和潜力所衡量,二是对结果的影响来衡量。但是,相对来说,第一种途径比较容易,第二种途径只能凭感觉与体验。于是,研究权力的通常方式是枚举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或资源,学者和政治家们往往根据国家所拥有的资源(resource),来衡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之大小。因为一般说来,资源是权力的基础或者权力的源泉(source),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越多,它在国际政治中所具有的权力也就相应越大。但是,国家权力的资源是很多的,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政治稳定性等等诸多要素。这样一来,权力的含义往往基本上就等同于权力的资源,或者说权力和权力资源这两个本来不同的概念常常是等同的,或者说往往被加以混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权力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具体和容易衡量,不像权力那样看不见、摸不着。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权力资源和权力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拥有权力资源,并不意味着必然拥有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资源只是潜在的权力。而且在权力资源的诸多要素中,也有一些要素是很抽象的、难以衡量的,比如前面所说的政治稳定性。不仅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决定国家权力大小的资源要素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18世纪欧洲的农业经济国家中,人口是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征兵的基础。而对于19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来说,铁路系统的运输能力和机动能力成为重要的权力资源。进入核时代之后,先进的科学技术则是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

尽管权力的资源或者权力的源泉多种多样,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倾向于关注那些相对有形的或者具体的权力资源要素,因为这样就比较容易衡量一个国家权力的大小及判断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然而,这样的做法往往忽视了构成权力基础的那些无形的和抽象的要素。正是鉴于此,奈试图改变这种权力分析的方式,从而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然而,相对于硬权力资源来说,软权力资源更难衡量和测定,因为后者是非物质性的、抽象的、无形的。奈所说的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议题的能力等等,都是很抽象的东西,很难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 版，第 19 页。

加以测定和衡量。这是奈软权力思想遭到批评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奈在《软权力》中,利用统计数据和图表,试图对软权力资源进行一些量化分析。这可以从他对美国、苏联、欧洲、亚洲所具有的软权力资源的描述和分析中体现出来。

他所列举的可以量化的美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软权力资源包括:美国所吸引的外国移民人数;美国出口的电影和电视产品数量;在美国就学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在美国教育机构中的外国学者数量;美国出版书籍的数量;美国电脑网站数量;获得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美国人数;美国人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等等。奈认为,美国在上述指标方面,均居世界首位,由此可以了解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此外,他还通过几组统计数据,来衡量美国的软权力。这些统计数据包括:2002年世界上43个国家对美国科技水平、音乐、电影、电视、民主思想、做事方式、理念与习惯等等的评价;1982~2003年西欧主要国家对美国有好感的人在当地人口中的比重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现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比如,他在书中引用了英国广播公司2003年在11个国家(包括美国)进行民意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65%的人认为美国很傲慢。

在分析前苏联所拥有的软权力时,他列举了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如1957年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芭蕾舞剧团和交响乐团在世界上的声誉,以及苏联体育代表团在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绩等等。

奈试图用一些具体数据来说明,欧洲目前是美国在施展软权力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比如,世界上10种最流行的语言中就有5种属于欧洲语言,其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把伊比利亚半岛同拉丁美洲联系在一起,英语是美国和广大的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而将近50个法语国家的首脑每两年定期会晤,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数量上,法国居世界首位,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名;在诺贝尔物理和化学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p. 33~34.

Ibid., pp. 36~72.

Ibid., p. 67.

Ibid., pp. 73~74.

奖得主数量上,英、德、法分别列第二、第三和第四位;在音乐产品的销售量上,英、德、法分别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仅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图书销量分别列世界第三和第四位,其互联网网站的数量分别列世界的第四和第五位;去法国旅游的人数超过去美国旅游的人数;英国和德国是世界上吸引政治避难者申请避难最多的国家;法、德、意的婴儿存活率都高于美国;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海外发展援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大于美国;足球是欧洲最重要的体育项目,它比美国的橄榄球和棒球更具全球性,等等。

奈还用相同的方式大致衡量了亚洲的软实力资源。在奈看来,日本是拥有最多潜在软实力资源的亚洲国家,因为它是第一个彻底实现现代化、在国民收入和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平起平坐的亚洲国家,同时它又有能力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奈列举了一些能够说明日本具有很多潜在的软实力资源的指标,其中包括:日本的专利数量居世界首位;研究和开发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居世界第三位;国际航空旅行的人数居世界第三位;图书和音乐产品销售量居世界第二位;互联网网站数量居世界第二位;高科技出口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发展援助数额居世界首位;人均寿命居世界首位。在谈到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时候,他只是简单地提及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的华文电影、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明星姚明、载人航天飞行计划等几个方面。

应该说,奈在软实力资源的量化分析上所做的努力,确实有很大的意义,也能给研究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一个国际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所拥有的软实力,的确可以从一些可量化的统计数据中部分反映出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供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然而,从根本上说,软实力的大小是无法用量化的方法被加以准确地统计出来的。即使软实力资源的大小可以被大致计算出来,我们仍然难以判断软实力资源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它们对某个国家的行为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毕竟那些可以量化的软实力资源也只是潜在的软实力而已。也就是说,奈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软实力思想的局限性。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因此指责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p. 75 ~ 83.

Ibid., pp. 83 ~ 89.

奈的软权力思想缺少“科学性”。如果用“硬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科学的。

四 结 论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提供了一种分析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之重要思路,它引导人们关注那些抽象的和非物质的权力因素,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价值观的感召力、塑造国际规则或决定国际议题的能力等等。这样的分析视角,无疑于有助于人们克服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判断和分析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实际上,传统的权力思想,包括经典现实主义思想,既重视具体的、物质性的权力因素,也关注抽象的、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这同奈主张软硬权力并重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奈的软权力思想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回归。

奈把权力简单地一分为二,这使得其软权力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他无法阐述清楚软、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软权力的大小也难以被测定和衡量。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分析国际舞台上权力地位的思路,奈的软权力思想仍然能够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AMERICAN STUDIES QUARTERLY

Spring 2005

Vol 19, No 1

ARTICLES

The Second Bush Administration's Global Strategy and China-US Constructive Cooperative

Relations *Yang Jianjian* (7)

The reelection of George W. Bush indicates tha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US global strategy is its continuity. With 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President Bush will make some modest adjustments in US global strategy and Asia-Pacific policy in his second term, with focus o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nd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fighting against terrorism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will be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safeguarding of America'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The coming four years will also be a key period for elevating and deepening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Initial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interactive principle of core interests, important interests and general interests, and relate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have also been formed. Meanwhil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has assumed an increasingly multilateral facet, and the two countries need to enrich their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s, substantiate the content of strategic dialogue, and handle the Taiwan issue from the strategic and all-dimensional perspective so as to stabilize and develop this relationship.

An Analysis of Joseph Nye's "Soft Power"

Concept *Zhang Xiaoming* (20)

Joseph Nye first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the early 1990s. The soft power of a country rests primarily on three resources: its culture, its ideology or political values, and its a-

bility to shap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political agendas. It i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analyzing the power position of a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focusing on the nonmaterial aspect of power once neglected by many people. "Soft power" is a creative concept coined by Nye, but it also reflect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ower. Nye's concept of "soft power" has its own weaknesses, because Nye could not fully elaborate on the interplay of hard power and soft power,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the soft power in a quantitative way.

The Social Capital of American Religious

Groups *Liu Peng* (37)

Religious groups are the largest possessors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ajor feature of social capital is that the more it is used, the higher the value will be. Religious groups consider social services and charity work the best form of realizing their value and seeking returns. This is a unique way of the religious groups in the use of their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American religious groups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the law ensuring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but also due to a smoothly functioning omnipresent social network, formed by a broad horizont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its followers. Religious groups, relying on the growing value of their social capital, stand on the frontline of satisfying the basic demand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and patching up social conflicts, thus playing the role of a social safety valv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Fu Meirong* (57)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United States vigorously gaining strength in all industries of its economy and exhibiting unparalleled power in the world. A key reason for this remarkable success is America's high-level manpower, i.e. its edge in human capital. Based on human capital theories, the Talent Gradation Principle and the Pareto Efficiency Principle, this qualitative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in the 20th